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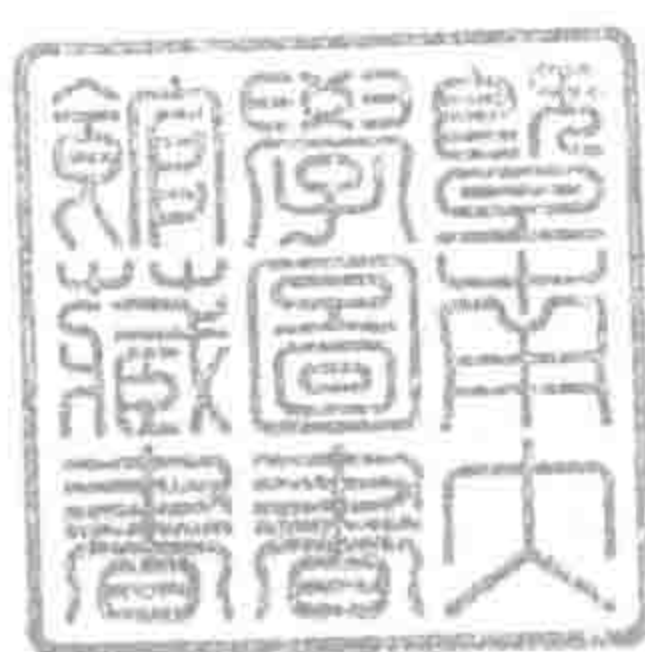
李建平◎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

李建平◎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 / 李建平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203-0961-5

I. ①先… II. ①李… III. ①古漢語-數量詞-研究-先秦時代 IV. ①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20230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任 明
責任校對 朱妍潔
責任印製 李寡寡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31
插 頁 2
字 數 508 千字
定 價 125.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 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一種語言所具有的特點是最值得研究的，也是首先需要研究的。我們都知道，漢語有三大特點，一是靠詞序和虛詞來表示語法關係，二是有聲調，三是有豐富的量詞^①。前兩者的研究都比較清楚了，僅有先秦兩漢的聲調情況還不太清楚；而後者的研究就顯得太薄弱了，哪一歷時階段有哪些量詞，每一個量詞的語源是什麼，其語法化動因與路徑如何，等等這些，我們都還知之甚少。學界公認的真正的量詞斷代史成果目前只有劉世儒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②，更不要說有一部《漢語量詞通史》類的著作了。

縱觀整個量詞史的研究，最爲薄弱的是先秦兩漢量詞研究。其重要原因是這個時段的研究資料缺乏，傳世先秦兩漢文獻不僅很有限，而且又受到語料的真實度問題的制約。地不愛寶，儘管近現代的中華民族往往多災多難，而上帝在古文獻的賜予方面是偏愛我們的，百年來考古出土了大量的地下文獻，並且有很多是當事人記當時事的“同時資料”，爲我們研究包括量詞在內的語言文字提供了豐富的、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正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言：“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

余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開始接觸簡帛文獻，就發現內中有大量的量詞，特別是其中的遺策簿籍類文獻，量詞尤其豐富，而此類文獻又恰恰是傳世先秦兩漢文獻所未見的，自然其中有不少量詞不見於同期傳世文獻。

① 漢藏語系和南亞語系中的有些語言也具有不少量詞。

② 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 1965 年版。

這為我們研究先秦兩漢時期的量詞甚至構建這段時期的量詞史，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只要先秦兩漢量詞史弄清楚了，漢語量詞通史就好構建了，因為之後各個時段的語料都比較豐富，只需我們去認真梳理辨析了。由此我便萌生了從簡帛量詞研究着手，吸收甲骨文金文等有關成果，先研究先秦兩漢量詞，繼而向下探賾，最後寫一部《漢語量詞發展史》的想法。但是，一個人的學術生命是有限的，上帝賜予你的做學問的時間是有限的，很多美好的科研設想往往都因為時不我予而無法實現，於是，我便將此量詞研究的項目交給適合的學生來做。^① 建平於 2001 年從余攻讀碩士學位，屬於我招收的第四屆碩士生，一進校我就給他確定了古代漢語量詞研究的學術目標，學位論文題目就確定為《先秦簡牘量詞研究》，主要以楚簡和秦簡作為研究的資料來進行研究。論文於 2003 年寫成並順利通過答辯，得到專家一致好評，獲得碩士學位。2005 年，我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簡帛量詞研究》，建平作為主要研究者之一參加了該項工作，並和我共同順利完成了項目，目前同名結項成果已由中華書局於今年 6 月正式出版。建平 2007 年又從余攻讀博士學位，我們共同確定《先秦兩漢量詞研究》作為其博士論文題目，在已有成果基礎上擴大研究範圍。先秦兩漢時期文獻數量眾多，性質複雜，工作量大，建平在讀博期間夜以繼日，於 2010 年順利圓滿完成了論文，並被評為重慶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現在，建平對其博士論文進行加工修改潤色，即將正式出版，付梓前向我索《序》，因為有關量詞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多多少少有些思考，故願在此談談與該書有關的問題。

斷代史研究是漢語量詞發展史研究的基礎，要構建漢語量詞通史，必須首先研究好各個歷時階段的量詞史。但由於古代文獻汗牛充棟，任何一個歷時階段的文獻都極其龐雜，要寫任何一個時段的量詞斷代史都是頗為困難的。如得到學界一致好評的量詞斷代史專著劉世儒先生的《魏晉南

① 由於受到我碩士導師四川大學經本植教授的薰陶，深知“同時資料”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故原來還曾設想既要做簡帛研究，還要做碑刻研究。後來（1998 年），從四川省阿壩師範專科學校調至我西南師大（現西南大學）文獻所工作的從事《左傳》研究的毛遠明先生，正苦於找不到理想的研究領域，向我求教，我便建議他改做碑刻研究，於是把我的有關碑刻的資料也給了他。毛先生三年後便開始出碑刻成果，十年便成了碑刻專家。現在看來，我把自己原想研究的領域“轉交”給毛先生是正確的，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一輩子做不了多少事，把自己認為有價值的研究領域或課題“給”別人來做，是一個學者應有的義舉。

北朝量詞研究》，內中也有不少瑕疵，我們在進行出土文獻時就發現了該書這方面的不少問題，汪維輝先生在對《齊民要術》詞彙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該書不少相關問題，可見量詞斷代史研究之難，所以，建平的這部《先秦兩漢量詞研究》的完成是不易的。

語料蒐集與整理是漢語史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決定性的環節。先秦兩漢的語料多而複雜，甲骨文、金文、簡帛、碑刻等出土文獻的釋讀不易，有些語料的斷代不易；傳世文獻的真偽和斷代也不易。比如《墨子》中《備城門》以下諸篇與此前諸篇的成書相比顯然要晚得多，不能視為同一歷時階段的語料；雖然入土時代即為出土文獻的書寫時代的下限，但對於書籍來說，其成書時代仍要分析，如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雖然墓葬時代為西漢初年（漢文帝前元十二年），但其成書時代我們推測當在戰國晚期。建平在研究過程中，對所用語料都進行了細緻分析，對文本進行全面整理與研究，並廣泛搜集不同的版本，進行比較與考訂，首先確定語料的真實性，這為其研究的科學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出土文獻研究來說，不僅要藉助整理者的釋文，還要廣泛吸收整理報告發表後學界的有關釋讀成果，並且必須認真核對圖版，以確定最可靠的釋文。建平在此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如稱量車的個體量詞“輛”先秦兩漢文獻均作“兩”，但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簡130原整理者釋文“功閒大車一輛”，出現了“輛”，頗為可疑。建平細審圖版，發現“輛”為整理者之誤釋。此類成果書中有很多，建平在量詞研究過程中先後在《考古與文物》《中原文物》和《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篇與量詞有關的簡帛、碑刻文獻釋文考訂的論文，可見其對語料考察之精。

該書貫徹二重證據法，綜合考察了先秦兩漢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總計200多種（批），釐清了該時期量詞的基本面貌，對所得的339個量詞的語源及其在先秦兩漢的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考察。通過研究發現，其中多達106個量詞修正了此前研究的結論，或訂補了有些量詞原來的釋義、或增補了原來未知的本時期量詞的新成員、或補充了一些量詞用例的缺無、或提前了一些量詞的初始用例，等等這些^①，讓我們對這一時期的量詞狀況有了全新的認識，同時也為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和修訂提供了寶貴的資

^① 可參該書之《附錄一》。

料。先秦兩漢時期是漢語量詞的源頭，該書不僅是漢語量詞發展史的寶貴成果，也是漢語歷史詞彙的重要成果。

該書屬量詞斷代史研究，但該書並不僅局限於斷代研究，對不少量詞也展開了歷時研究，例如對泛指量詞“枚”和“個”興替的考察，對稱量車的量詞“兩”和“乘”的研究等等，均做了仔細的歷時研究。還值得稱道的是，書中往往不光考察這些量詞的演變興替，還進一步考察分析了其興替演變的動因等問題，這顯然是難能可貴的。

漢語有豐富的量詞，而漢藏語系的其他一些語言，以及南亞語系的不少語言，也具有量詞（或稱“單位詞”），過去研究漢語量詞的論著，往往將研究材料的範圍局限於漢語本身，未能將視野擴大到世界各語言的大範圍來研究漢語量詞。我們認為，具有量詞的語言在為何有量詞和如何使用量詞上一定有其共性，在研究漢語量詞時則很有必要聯繫有關語言的情況來進行考察，這一定對漢語量詞的研究有利。該書在研究中，能在綜合運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語料的基礎上，將視野進一步拓寬，既善於借鑒民族語言研究的成果，又善於考察漢藏語系、南亞語系量詞語言中量詞的發展情況，從而發現並論證了雙音化趨勢在量詞語法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一研究方法和所得結論，顯然是十分可喜而寶貴的。

如上所述，先秦兩漢文獻資料非常複雜，特別是有些出土文獻的釋讀難度極大，有些詞語是否是量詞還存在很大爭議，該書本着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將此類量詞作為“疑似量詞”附錄於書後，並逐一考察與分析，體現了作者踏實、嚴謹的學風。

建平長期致力於漢語量詞發展史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先後主持了有關量詞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多項，在《中國語文》《古漢語研究》《語言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40餘篇，並多次被人大複印資料《語言文字學》《經濟史》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全文轉載，本書即將付梓，而其量詞研究的另一部專著《隋唐五代量詞研究》也已出版，真是可喜可賀！希望建平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向着既定的目標，勇往直前，先完成各時段的量詞斷代史研究，然後完成漢語量詞通史的研究，最終寫出一部《漢語量詞發展史》，填補漢語史研究無量詞通史這一空白，為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目標是遠大的，道路是崎嶇的，前行是艱難的，在當今物化浮躁的社會，真要能靜下來做學問不易，願建平“既學

便當窮遠大”，勿事小行盡短視，相信建平是可以達到目標，完成預期的研究計劃的。

是爲序。

張顯成

2017年9月3日於西南大學竭篤齋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現狀與語料	(1)
第一節 量詞的界定與分類	(2)
第二節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現狀與展望	(11)
第三節 先秦兩漢語料述略	(24)
第二章 個體量詞研究	(48)
第一節 泛指型個體量詞	(48)
第二節 外形特徵型個體量詞	(63)
第三節 非外形特徵型個體量詞	(104)
第四節 拷貝型個體量詞	(172)
第五節 小結	(175)
第三章 集體量詞研究	(179)
第一節 外形特徵型集體量詞	(179)
第二節 非外形特徵型集體量詞	(199)
第三節 小結	(232)
第四章 借用量詞研究	(235)
第一節 泛指型借用量詞	(236)
第二節 容器型借用量詞	(238)
第三節 載體型借用量詞	(278)
第四節 小結	(280)
第五章 制度量詞研究	(283)
第一節 度量衡制度量詞	(283)
第二節 面積制度量詞	(307)
第三節 貨幣制度量詞	(315)
第四節 布帛制度量詞及其他	(317)

第五節 小結	(321)
第六章 動量詞研究	(323)
第一節 專用型動量詞	(326)
第二節 借用型動量詞	(339)
第三節 小結	(343)
第七章 先秦兩漢量詞的特徵及其歷時發展研究	(345)
第一節 先秦兩漢量詞特徵研究	(345)
第二節 先秦兩漢量詞歷時發展研究	(356)
附：先秦兩漢量詞總表	(367)
第八章 先秦兩漢數詞與數量表示法研究	(371)
第一節 先秦兩漢數詞研究	(371)
第二節 先秦兩漢數量表示法研究	(389)
第三節 小結	(408)
第九章 漢語量詞語法化的歷程及其動因研究	(414)
第一節 漢語雙音化趨勢與量詞的發展	(417)
第二節 漢藏和南亞語系量詞的產生與雙音化	(431)
第三節 從拷貝量詞和泛指量詞興替看量詞語法化動因	(434)
第四節 小結	(438)
附錄一 先秦兩漢量詞的詞彙史價值研究	(440)
附錄二 先秦兩漢待考量詞研究	(468)
参考文献	(480)
後記	(486)

第一章

先秦兩漢量詞研究現狀與語料

量詞豐富是漢語乃至漢藏語系諸多語言語法的重要特點之一，因此量詞研究也一直是語言學界所關注的重點；漢語量詞系統的產生、發展和成熟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語法化歷程，其語法化的動因與機制也一直是漢語發展史研究的重點與熱點問題。殷商至西周時期是漢語量詞的萌芽階段，春秋戰國至秦是漢語量詞的初步發展階段，兩漢時期則是漢語量詞的茁長階段，因此系統地整理與研究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量詞，不僅對先秦兩漢量詞斷代史的研究具有決定性作用，而且對於進一步探討漢語量詞系統，乃至漢藏語系、南亞語系等量詞語言中量詞系統的產生、發展及其語法化動因與機制等問題都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如劉世儒先生所言：“對於漢語量詞史的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漢語量詞，歷史悠久，材料浩繁，全面地進行研究，這顯然不是一人一時所能辦到的事。因此，我們應該盡先來作斷代史的研究。我以為，祇有把量詞的各個歷史橫断面兒都研究好了，漢語的整套的系統的量詞史纔有可能建立起來，否則沒有材料，‘遊談無根’，要建立科學的漢語量詞發展史那是永遠也不會辦到的。”^① 劉先生首先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量詞系統進行了全面考察，完成了我國第一部漢語量詞斷代研究的專著《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並由中華書局於1965年出版，為漢語量詞研究、特別是量詞斷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並提供了範本，此後漢語量詞研究發展迅速，大量學術論文湧現出來，但全面系統的量詞斷代史研究仍然罕見，進一步的漢語量詞通史的書寫更是道長路遠。因此，本書試圖借鑒前人及時賢的研究成果、理論和方法，對先秦兩漢時期文獻中的量詞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與研究，進而對先秦兩漢量詞系統作一斷代史研究，從而力圖使上

^① 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頁。

古漢語量詞發展史的研究擺脫目前可謂“遊談無根”的現狀。

第一節 量詞的界定與分類

自《馬氏文通》(1898)以來的早期漢語語法學,是在西方語言學框架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由於印歐語系語言的詞類中沒有量詞,因此初創時期的漢語詞類系統中也沒有單獨的“量詞”這一詞類;但這並不表示語言學家們沒有認識到漢語中量詞的重要性,其實量詞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漢語研究者的關注。如作為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研究古代漢語的語法專著,《馬氏文通》雖然沒有在詞類系統中將量詞獨立出來,而是歸入名詞之中,但馬建忠卻已經認識到了量詞及其語法位置的特殊性:“故凡物之公名有別稱以計數者,如車乘、馬匹之類,必先之。”^①何傑認為:“馬建忠先生稱量詞為記數的別稱,已難能可貴。從此開量詞研究的先河。”^②此後至今一百多年來的漢語研究中,量詞及其相關結構等問題的研究一直為學界所關注。

一 漢語量詞的定名

由於缺乏形式標記和形態變化以及詞的多功能性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量詞”這一名稱的確立和界定成為量詞研究史中的第一個難點。按何傑的統計^③,自《馬氏文通》至上世紀五十年代量詞的最終定名,學界先後提出了16種名稱之多,可見漢語量詞定名之艱難。參照何傑和李建平的論述^④,我們將在漢語語法研究史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主要觀點歸納如下表。

表 1-1 量詞定名發展簡表

時間	學者	著作或文章	名稱	歸類	說明
1898	馬建忠	《馬氏文通》	凡物之公名有別稱以計數者	名詞	開量詞研究之先河。

①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2—123頁。

② 何傑:《現代漢語量詞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③ 同上書,第7頁。

④ 李建平:《百年來古漢語量詞研究述評》,《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續表

時間	學者	著作或文章	名稱	歸類	說明
1922	陳承澤	《國文法草創》	表數之單位	名詞	
1922	金兆梓	《國文法之研究》	量詞	—	實指數詞和形容詞，非量詞。
1924	黎錦熙	《新著國語文法》	量詞	名詞	界定：量詞就是表數量的名詞。並提出：量詞的種類 = 國語的特點。
1930	楊樹達	《高等國文法》	數量形容詞	—	實指數詞，非量詞。
1943	王力	《中國現代語法》	單位名詞	名詞	
1942	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	單位詞	指稱詞	第一次區分了“名量”和“動量”。
1948	高名凱	《漢語語法論》	數位詞 次數詞	獨立	指出：“數位詞是漢藏語系的特點。”但歸入虛詞大類之中。
1951	陸志韋	《北京話單音詞詞彙》	助名詞	指代詞	
1953	呂叔湘	《漢語學習》	副名詞	名詞	但又可稱為“單位詞”或“量詞”。
1952— 1953	丁聲樹等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	量詞	獨立	界定：量詞通常用在指示代詞或數詞的後面，名詞的前面。
1954— 1956	丁聲樹等	《“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述》	量詞	獨立	界定：表示事物或動作的數量單位的詞是量詞。……量詞有兩種：計算實體事物的是名量詞，計算動作行為的是動量詞。

續表

時間	學者	著作或文章	名稱	歸類	說明
1958	王力	《漢語史稿》	單位詞	名詞	提出：“（天然單位）是東方語言所特有的，特別是漢藏系語言所特有的。”分事物單位和行為單位兩種。
1961	朱德熙	北大授課《語法講義》（1982）	量詞	獨立	界定：量詞是能夠放在數詞後面的粘著詞。

可見，自 1898 年《馬氏文通》語法學初創以來，馬建忠就認識到了漢語量詞的特殊性，但受印歐語法詞類體系的影響而未能將其獨立作為一大類，此後諸多語言學家在其專著中都涉及了量詞的語法特點，逐步展開了深入地分析與探討，強調了漢語量詞的特殊性，但受印歐語系語法詞類體系劃分的束縛而長期沒有將其從名詞中劃分出來獨立為一類，其語法研究的地位也就難以彰顯。直到 1952—1953 年丁聲樹等《語法講話》在《中國語文》連載纔將其真正獨立為一個詞類，但名稱仍未完全確定；1954—1956 年擬定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纔正式定名為“量詞”並予以定義。然而由於西方語法體系中沒有量詞的名稱，稱為單位詞（measure word）或單位名詞（partitives），因此在漢語語法研究中採用“量詞”還是“單位詞”的名稱一直存有爭議，如 1981 年王力先生在《詞類》一文中仍然認為數詞應當同英語的傳統語法一樣歸入形容詞，“量詞也是名詞的一種，所以我把它叫做單位名詞”，但又說：“數詞和量詞獨立成類，我也並不十分反對，還可以再商榷。原因之一是，量詞在西洋語言里是沒有的，可見它比較特殊。”^① 郭紹虞《漢語語法修辭新探》則提出：“‘量詞’可以概括‘單位詞’，而‘單位詞’則不能概括‘量詞’，這是明顯的事實。”^② 從附屬到獨立，從名稱不一到定名為量詞，反映了語言學界對量詞語法特點認識的逐漸深入和對其研究價值的確認。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隨著量詞本體研究的拓展與深入，量詞的名稱

① 王力：《詞類》，載《王力文集》第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2 頁。

② 郭紹虞：《漢語語法修辭新探》，商務印書館 1979 年版，第 48 頁。

及其獨立作為漢語詞類系統的一員逐漸為語言學界所共同接受，作為漢語重要特點的量詞的研究價值也日益凸顯出來，逐漸成為漢語語法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對漢語量詞的研究也纔逐漸全面深入地展開。

二 漢語量詞的界定

由於缺乏形式標記和形態變化以及詞的多功能性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漢語詞類的劃分一直是個老大難的問題，主要由名詞、動詞等其他詞類語法化而來的量詞更是如此。在量詞的兩大類系中，名量詞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產生了，經過長期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獲得了較為廣泛的使用，到兩漢時期使用頻率進一步提高；而典型的動量詞在先秦還沒有產生，直到秦簡中纔開始出現萌芽，到兩漢時期動量詞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範疇。先秦兩漢時期，名量詞數量眾多，語法功能比動量詞也更為複雜，因此其界定難度也更大。茲分類介紹如下。

（一）名量詞的界定

漢語語法學初創時期，往往按照意義標準來劃分詞類，雖然做到了“詞有定類”，卻導致了“類無定職”。後來借鑒結構主義語法理論，學界多採用形態標準來劃分詞類，則又容易導致了“詞無定類”。趙元任在《國語入門》（1948）中首次系統利用語法功能標準劃分詞類，在《漢語口語語法》（1968）中更為全面採用了這一標準。朱德熙（1982）也多次強調漢語詞類劃分的本質標準是“詞的分佈”，此後佔主導地位的漢語語法體系在劃分詞類時採用語法功能（即詞的分佈）標準，或者認為必須排斥意義標準，或者認為可以把意義僅僅作為一種參考。但是漢語詞類和語法功能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對應關係，正如沈家煊所言“漢語詞類和句法成分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且“實際上我們在選擇什麼樣的分佈標準時已經憑藉意義”^①。可見，所謂分佈標準的選擇實際上還是藉助意義作為根據的，因此本書在詞類劃分時讚同沈家煊提出的“可以藉助於從意義出發選擇的分佈標準”^②。

漢語的量詞系統不是先在的，而是由名詞、動詞等其他詞類語法化而來的，因此量詞與其源詞類之間的界限往往是連續的，而不是離散的。特

① 沈家煊：《不對稱與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頁。

② 同上書，第250頁。

別是在漢語量詞萌芽的先秦兩漢時期，諸多量詞的語法化歷程剛剛開始，其語法功能和其源詞類往往糾結在一起，很難截然分開，因此對量詞語法化程度的判斷是量詞語法化研究的難點。目前，學界較為通行的對量詞的界定方法，如朱德熙《語法講義》提出：“量詞是能夠放在數詞後頭的粘著詞。”^①但是，這一標準適合於量詞發展的成熟期，在先秦兩漢漢語中數詞和名詞或形容詞直接結合不用量詞的情況佔據絕對優勢，如此則無法把名詞、形容詞和量詞分開。郭錫良則認為：“到了魏晉以後，名詞變得不能直接同數詞結合了，中間必須加上一個單位詞；而單位詞卻總是直接同數詞結合成數量結構，用作句子中的一個成分。這時單位詞和一般名詞的語法功能、語法作用有了明顯的區別，纔能說單位詞已經從名詞中分化出來，成了獨立的一類詞——量詞。”^②正如郭先生所說，量詞成為稱數結構中的必要成分是量詞系統成熟的標誌，在量詞系統的萌芽期量詞並不一定會都出現在“Num+CL+NP”結構中。

根據先秦兩漢時期量詞系統的特殊情況，本書在界定名量詞時採用以下標準：

1. 從形式上來看，是否處於“NP+Num+X”或“Num+X+NP”結構中X的位置；
2. 從語義上來看，處於“NP+Num+X”或“Num+X+NP”結構中的“Num+X”是否表示其中NP的量；
3. 當“NP+Num+X”或“Num+X+NP”結構中的NP省略時，如果可以根據文意補出NP，則視為“NP+Num+X”或“Num+X+NP”結構；
4. 當“Num+X”中Num為“一”而省略時，如果根據文意可以補足，則視為“一+X”結構。

根據標準1，我們可以將數量表示法和其他的語法結構區分開來；參照標準2，我們把數量表示法中數詞同名詞、形容詞等結合而與其他名詞連用的情況區分開來；藉助標準3則避免遺漏數詞和量詞結合時省略名詞的情況；藉助標準4則避免遺漏量詞單獨使用的情況。

量詞的語法化是一個長期的、漸變的歷時過程，從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其他詞類到量詞語法化的程度由低到高構成一個“斜坡”（cline），

①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8頁。

② 郭錫良：《從單位名詞到量詞》，載《漢語史論集》，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6頁。

體現出逐漸演變的特點，在這一斜坡上兩個範疇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即“A>A/B>B”。沈家煊也指出：“詞類和詞類之間不是離散的而是連續的”，“詞類的典型理論認為一類詞的内部具有不對稱性，有些成員是這類詞的典型成員，有些則是非典型成員。”^① 吳福祥在對魏晉南北朝名量詞的研究中，提出了對量詞範疇歷時演變中語法化程度判斷的三個參數：A. 文本頻率，即“量詞/單位詞”在數量結構中的使用頻率；B. 句法行為，即“Num+Cl+N”與“N+Num+Cl”的比率；C. 語義語法化的程度，即個體量詞語義泛化的程度。^②

對於先秦兩漢時期來說，多數量詞剛剛開始其語法化歷程，其文本使用頻率較低，由於文本性質等原因數量結構往往置於名詞之後，即“NP+Num+CL”結構，其語義泛化程度往往不高，能夠與之相適應的中心詞的範圍也比較窄。而且在量詞的萌芽期，其源詞的意義往往大量滯留在量詞之中，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使用，導致量詞及其源詞的界限難以區分，無法成為量詞範疇的典型成員，但其中很多非典型的量詞在此後的發展中往往可以發展成為典型量詞，因此要深入探討漢語量詞語法化開始的時代及其動因與機制，探討每一個量詞的語源，對萌芽期非典型量詞的研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二）動量詞的界定

動量詞大多由動詞語法化而來，同名量詞一樣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在動量詞語法化的斜坡（cline）上範疇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因此萌芽期動量詞往往遺存了一定的動詞性。由於漢語缺乏形態標記，對動量詞的界定同樣成為一個難點，對其產生時代的不同認識往往也與此密切相關。由於先秦兩漢時期動量詞的發展非常緩慢，動量詞系統成熟以後的各種變式在這一時期基本沒有出現，因此對上古時期動量詞的界定應當綜合語法功能和語義兩個方面的標準：

1. 從形式上來看，是否處於“VP+Num+X”或“Num+X+VP”結構中X的位置；
2. 從語義上來看，處於“VP+Num+X”或“Num+X+VP”結構中的“Num+X”是否表示其中VP的量；

① 沈家煊：《不對稱與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

② 吳福祥：《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名量詞範疇的語法化程度》，載《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三），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46頁。